

台湾政治转型后政党体制的演变及发展趋势

孙 云*

[摘 要] 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后,伴随着国民党的党务革新、解除戒严、解除党禁和报禁,以及终止“戡乱时期”,台湾进入重要的政治转型期。突出的标志是一批新党相继建立起来,呈现国民党一党优势下的多党竞争局面。随着政治转型的不断推动,台湾的政党体制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推动政党体制演变的原因非常复杂,社会经济状况、政治思想意识及选举制度都会对政党体制的形成与演变产生重要影响。对台湾来说,省籍与族群矛盾、国民党长期的威权统治和黑金政治以及民主化和本土化等,都是台湾政党体制形成与演变的重要原因。展望未来,台湾政党体制似乎出现了政党的集中化、政党的力量对比有利于民进党以及政党的趋同化加剧等几大趋势。

[关键词] 政治转型 政党体制 演变趋势

一、政治转型后台湾政党体制的发展演变

政党体制,英文为 Party system,也有人将其称为政党体系。对政党体制的意涵,学者们看法很不一致。法国著名的政治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在其 1951 年的著作中,把政党体制看作是政党“相互作用的形式和模式”。《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在“政党”的词条中没有对政党体制做出简括的定义,但它指明,政党体制的研究就是研究“政党组织之间相互竞争作用的形式”。中国有学者指出,政党体制是狭义的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的体制呈现形式,或曰政党组阁和执政的方式、方法。台湾学者吴文程虽然将政党体制称为“政党体系”,但他所论述的含义与西方学者有很大的一致性。吴文程认为,“政党体系”所指涉的乃是以政党之间彼此的互动关系作为分析的基础。在研究整个政治运作的过程中,它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分析框架,研究者可借由一种较宽广且客观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避免片面或个别政党研究所造成的狭隘缺憾,因为政党仅能代表部分,而政党体系则是由许多部分所组成,彼此互动所产生的结果。此外,政党的活动方式往往深受政党体系的影响,因此当我们欲了解一国政治运作现象时,自然应从政党体系的概念出发,如此方可获致一较全面且较有意义的研究成果。^[1]

政党体制的主体是政党,它所探索的是政党间的竞争与互动关系,这既指政党的数量,也指政党的力量。

一般认为,台湾的政治转型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开始酝酿,80 年代中期开始实施。80 年代后期,伴随着国民党的党务革新、解除戒严、解除党禁和报禁,以及终止“戡乱时期”,台湾的政治体制或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对权力的垄断开始瓦解,台湾社会逐渐进入了开放与政治多元以及政党竞争的时代。其中,政党体制的变化是观察台湾政治生态变化的最明显的指标。

伴随着政治转型,台湾的政党体制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过程。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1. 一大一小不完全竞争的两党体制 (1986-1993)

1986年,民进党成立。其党纲和党章主张“各政党和平共存、公平竞争”,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1987年国民党当局宣布“解严”之后,台湾政党政治迅速发展。1989年,“立法院”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同时,国民党通过依该法办理政党登记。民进党则于2月13日同意依法登记为政党,4月29日向内政部正式办理。

解除“党禁”后,岛内形成了一股组党热潮,组党数目急剧增加。除民进党外,同期新建的党还有中国自由党、民主自由党、中国民主正义党、工党、中国民众党、劳动党、和平统一党、自由民主党等,以及仅有招牌、但无党员活动的中华民族党。在这些新建的政党中,除民进党有一定规模和实力外,其他多为不具备完整形态和规格的小党,没有实质的政治影响。因此这时的政党体制,大体可被称为国民党与民进党一大一小的两党体制。

这个两党体制,只能称为不完全竞争体制,这主要是由于竞争目标的不开放。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的选举都只是局部的增额选举,选举的结果影响不了国民党掌控占绝大多数议席的老代表的事实。新选的委员、代表,并无法真正主导政策。此外,若干职位包括“总统”、“副总统”、省长、北高市长都未开放选举。因此,我们称之为不完全竞争的体制。

2. 两党体制的变形 (1993-2000)

1989年8月,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赵少康、郁慕明、李胜峰发起成立国民党内一个色彩鲜明的次级团体——“新国民党连线”,这是一个以促进国民党的政治革新、维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为宗旨的党内革新派。1993年,“新国民党连线”部分核心成员正式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新党。这是国民党退台40多年来首次出现的公开分裂,在国民党内部和台湾政坛造成极大震动。新党的成立,既是受国民党主流派“打击的结果”,也是不满国民党中央对“黑金”的包庇与李登辉的统独立场的结果。

新党成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了新党之后的选举,一些地方的确出现了国、民、新三党之间的竞争。例如,1994年的北市市长选举,北市议员选举和1998年的北市议员选举,这种竞争的态势相当明显(见下表)。1995年的“立委”选举和1996年“国大代表”选举中,新党也都赢得超过12%的选票。但是,这种情况也仅仅局限于台北市,在其他地区并不明显。故此新党被认为是“都会政党”,其力量并未扩散到全岛。因而从总体上说,全岛的选举仍然是国民党、民进党之间的竞争。新党的出现,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台湾国、民两党竞争的格局。同时,新党对两党格局的冲击,不仅在地域上有限,而且在时间上也很短。1998年之后,新党的力量急剧下降,并逐渐走向泡沫化。新党的骤起骤跌,恐怕是这一时期台湾政党体制的最大变化。因此,这一时期台湾的政党体制,只能说是两党体制的某种程度的变形。

3. 从多党竞争到两大联盟对峙的格局(2000至今)

2000年“总统”选举后,伴随着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台湾政党体制出现了新的局面。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由于原来同属国民党的连战与宋楚瑜同时参选,分割了国民党原有的票源,双双落败,民进党陈水扁上台执政,台湾实现了政党轮替,国民党执政50多年的历史宣告结束。选后,凭借其超人气,一些人拥戴宋楚瑜成立了亲民党。宋的支持者也主要是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标志着国民党的再次分裂,力量进一步下降。台湾出现了国、民、亲三党竞争并主导台湾政局的局面。2001年立委“选举”前,在李登辉的光环下,激进“台独”势力成立了台联党。随着新党的泡沫化,国、民、亲、台联党成了台湾政坛的要角。2001年“立委”选举成了多党之间的竞争。当然,在这多党竞争中,国民党、民进党仍然是主角。实际上,从意识形态来看,国、亲、新三党具有比较相同或相近的意识形态,而民进党与台联党位于意识形

态与统独光谱的另一端。随着 2004 年“总统”选举的到来，两大势力实现了整合。2004 年“总统”选举成了泛蓝、泛绿两大势力的对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台湾出现了两党政治的力量基础。伴随着选举制度的改革，台湾走向两党政治的趋势非常明显。

北市市长和市议员选举结果表(1989-1998)

单位：%

选举项目	国民党	民进党	新党	无党籍
1994 北市市长	25.9	43.7	30.2	0.3
1998 北市市长	51.1	45.9	3.0	—
1989 北市议员	66.2	22.6	—	11.2
1994 北市议员	39.5	30.4	20.8	9.3
1998 北市议员	40.1	30.9	18.6	10.4
1994 高市市长	54.5	39.3	3.5	2.8
1998 高市市长	48.1	49.0	1.0	2.0
1989 高市议员	61.0	20.4	—	18.6
1994 高市议员	46.3	24.6	4.8	24.0
1998 高市议员	45.2	26.8	3.8	24.2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政治转型后，台湾政党体制变化的曲线不大。一开始是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两党体制，政坛上政党数量的增加，也主要是来自于国民党的裂变。现在又出现了政党力量的聚合趋势，并且仍然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的竞争，将来有可能形成以这两党力量为基础的两党体制。从力量上看，政治转型后，民进党的力量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而国民党的力量不断下降，现在这一趋势仍未停止，有可能形成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局面。

二、台湾政党体制演变的内在动因

政党体制是特定民族国家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并且是在与动态的社会生态环境的联系中演化的。各国政党体制所真正脱胎的母体是特定的民族国家。各国经济、政治的社会性质，赋予了各国政党体制以共同的灵魂和精神，而各个民族国家的特殊社会生态环境，则赋予其政党体制以具体的形态结构和功能方式。

因此，影响政党体制形成的原因很复杂与多样，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不尽相同，这是各国政党体制差异的深层原因。实际上，研究政党的学者们很早就开始探讨各国政党体制的差异性，并试图用不同角度加以解释。法国学者迪韦尔热即指出，政党体制的形成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所造成，有的因素是各国普遍共有的，有因素则是由各国独特的传统与历史、宗教与信仰、种族成分与民族矛盾等等所造成，至于各国共同具有的普遍因素则有三个：社会经济因素、政治思想意识及选举制度。^[2]

学者们在分析各国政党体制的差异性时，比较重视社会因素与制度因素对政党体制的影响。从社会面向来看，基本上，政党体制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社会的结构与阶级特性。通常，当一个社会同质性很高，举凡在宗教、种族、语言或阶级间，皆无明显的对立或冲突时，则在争议性问题有限的情形下，社会共识较易凝聚，多数人的政治态度亦往往倾向温和中庸。而政党体制在形成时，则较能集中发展，不致出现多党制，这在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相反地，倘若一个社会的和谐程度很低，分歧性很高，则多党制的形成乃是无可避免的，此种情形尤以西欧国家为典型。由于阶级与宗教意识的强烈主张，使得政治社会的凝聚力难以建立起共识，长期以来的对立，使得各个政党皆拥有其特定的群众与支持基础，也因此多党体制的

形成乃成为理所当然的发展趋势。^[3]

在制度层面，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了选举制度对政党体制的影响。在为人所熟知的迪韦尔热定律（Duverger law）中，即对此种影响有具体的描述。^[4]迪韦尔热指出：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形成一个多数目、严格、独立且稳定的政党数目；两轮投票制则有利于一个多数目、松散、依赖性且相对稳定的政党数目；而简单多数则有利于产生两党制。^[5]以美国为例，在探讨美国两党制长期存在的原因时，制度论非常流行。制度论者认为，美国的两党制是美国选举制度和政府制度造成的。美国实行“一人当选选区制”和“相对多数票当选制”（得票不必过半数即可当选），也就是“胜利者得全票”制。这种选举制度有利于大党而不利于小党，从而产生和维护了两党制。而欧洲许多国家实行“多人当选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这种选举制度有利于小党的存在，故而产生多党制。^[6]另外，选举规则也对一国的政党体制产生重要影响。在这方面比较明显的就是有的国家在选举过程中有选举门槛的规定。如德国选举法规定，凡参加竞选的政党，在第二次投票中，按全联邦统计必须获得有效选票总数的5%以上，或者至少在第一次投票中有本党的3个议员候选人当选，才有权参加根据第二轮投票所得百分比进行联邦议院总议席的分配。这些条款有力地阻止了新党和地区性小党企图参与政权的行为，并迫使一些小党向大党靠拢，甚至接受兼并。德国从政党体制上长期维持着两大政党（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和执政小伙伴（自由民主党）的所谓两个半政党制，与德国选举规则有密切关系。^[7]

除了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影响之外，国家体制也是影响政党体制的重要因素。议会制度上的种种差别，对政党体制影响很大。一个特定的国家，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半总统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党体制的取向。以美国为例，美国是联邦制国家。美国两党制能长久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多数州的法律对成立新政党有限制。大多数州的法律都规定，新党申请成立要经上次州长选举时若干投票选民或百分之几的投票选民签名请愿书，当局始予考虑。在大多数州中，这需凑足几万人的签名，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及俄亥俄，约需259000人的签名。还有一些州的法律规定，必须在新党的州长候选人获得投票总数的5%的选票的条件下才承认该党的存在。因此新党成立极为困难。^[8]

以上这些因素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意义，当然也是影响台湾政党体制演变的原因。

当然，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党体制的演变，除了有一般规律可循之外，还受制于这个国家或地区本身的特殊性。这在剖析台湾政党体制演变与发展的脉络时表现得十分明显。

1. 省籍与族群矛盾在台湾有特殊的意义，并对台湾政党体制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在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与隔阂。这一方面是国民党当局制造二·二八惨案，给台湾本省人的内心和情感上带来难以拂平的创伤。同时，国民党长期垄断着岛内政经资源，并以“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体制控制及镇压台籍人士，加剧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这些本省籍人士本来在历史上就长期遭受荷兰、日本等异族统治，现在又受到从大陆来的外省人的统治，因此，台湾本省人将外省籍人士视为与荷兰、日本一样的外来统治者，不仅加剧了省籍对立，而且逐步产生出所谓“大陆意识”、“台湾意识”，乃至“大陆结”、“台湾结”，使省籍矛盾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重要矛盾。尤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选举成为台湾政治生活的常态，政治人物每逢选举就拿省籍、族群问题大做文章，借机煽动排斥外省人的情绪，进而制造社会的对立，收割选举的利益。

台湾的民主化、政治转型与本省人希望结束国民党专制独裁，本省人当家作主出头天的意识相伴随。我们看到，民进党成立后，由于其代表本土性的政治力量，因而乘着选举的阶梯一步步坐大，势力不断增强。而国民党的力量不断萎缩。民众的历史情结与本土情结通过选举发

生作用，深刻地改变台湾的政治生态，改变着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进而改变着政党体制。

2. 台湾政党体制的变化是台湾过去几十年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国民党退踞台湾后，长期维持着威权统治，垄断着权力和岛内政经资源，因此在推进民主化的进程中，国民党背着保守、威权的包袱。尤其到了李登辉上台后，国民党的黑金政治严重，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而且内部矛盾重重，派系争斗严重，不断发生分裂，力量不断下降，因此民众产生强烈的求变心理，希望换党换人做做看，对政党轮替有一种期盼。而民进党不仅代表着本土性的政治力量，而且代表清新、清廉、改革、反黑金的形象，深得选民的认同。因此，随着选举成为台湾政治生活的常态，民众根据自己的好恶进行投票，导致政党支持度和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深刻地改变着台湾的政治生态。到了2000年，随着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民进党也终结了国民党在台湾50多年的统治。就像有的学者所说，民进党支持度的上升，并不是这些人都赞成“台独”而不畏惧大陆用武，其中一些民众是出于希望尽快在台湾形成现代民主政治生态，反对国民党黑金政治的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希望通过政党轮替实现台湾的民主改革和社会进步，并非赞成“台独”。^[9]

国民党的外来色彩，长期的高压统治及黑金政治，预示着当台湾实现政治转型与民主化后，迟早会被替代。从世界走向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看，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大多会出现威权体制政党的力量下降或组织分裂最后失去政权的情况，以及新兴的贴近民意的政党崛起的过程。人们也高度评价政党轮替在民主化进程中的意义。

3. 台湾的民主化与本土化推动了台湾政党体制的演变。

所谓“本土化”，应有两层含义。广义而言是指在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建设的根植台湾取向，即政策台湾化；狭义而言，是指重要党政部门增加台籍人士的比例，即人员台籍化。^[10]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蒋经国为巩固国民党政权而推行的“政治本土化”，反映了台湾本省人当家作主的愿望和要求，符合台湾政治发展的潮流。本土化以台湾意识为基础，对民众有很强的号召力，很快就从政治层面扩展到文化各方面，90年代达到高潮。台湾的本土化与民主化紧紧结合在一起，显示出很强的力量，任何政治力量只能去适应它、顺应它，否则就很难有发展的空间。但90年代以来，台湾的本土化在政治人物的误导之下，已经发生了扭曲。本土化逐渐发展为对中国的排斥，到台湾主体性与主体意识的强化，从而导致从台湾意识中异化出“台独”意识。尤其民进党的上台后，通过在选举过程中的不断操弄，这些意识都大大强化了。似乎本土与非本土已经成为检验政治力量“爱台”还是“卖台”的尺度，似乎越“去中国化”，越鼓吹“台独”，越对抗大陆，就越本土，越爱台湾。在这样的误导之下，具有外来色彩的国民党在选举中变得很被动。而由于岛内非理性的选举文化，本土性政治人物以及政党更容易受到选民的认同。民进党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操弄这样的议题，并不断地获得政治上的好处，致使台湾的政治生态不断发生变化。

三、未来发展趋势

2004年“总统”选举后，台湾政党似乎处于一个新的盘整期，政党之间分化组合，台湾的政治生态处于深刻的变化当中，这些都会对台湾未来的政党体制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台湾又处于新一波的“宪政改革”当中，这会从更大的意义上影响台湾政党体制的发展。展望未来，台湾的政党体制似乎出现了这样几个明显的趋势。

1. 从政党的数量上看，出现了政党的集中化趋向，两党政治的趋势相当明显。

政治转型后，活跃在台湾政坛的主要政党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国民党与民进党一直是

其中的要角，而其他主要政党则基本上都是从国民党内部分裂出来的。2004年“总统”选举，促进了意识形态相近政党之间的互动与整合，政党的集中化趋向非常明显。2004年“总统”大选前，国亲实现了合作，国亲合作使民进党感受到了压力，激活了民进党与台联党的选举合作。因此2004年“总统”选举，产生了泛蓝、泛绿两大阵营的对决，这两大阵营的产生，不仅是意识形态为基础，也是以选举利益为考量，这样，使台湾逐渐成型了两党政治的力量基础。长期以来，台湾一直有人提倡两党政治，但由于缺少选举制度的配合和政党之间的联合，两党制的走向并不明显。近来，台湾“立法院”临时会，审议表决通过了“宪法”增修部分条文提案，其中有关“国会改革”部分，会对台湾走向两党政治起到推动作用。“国会”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议席减半，由现时的225席减为113席。选制由“复权选区一票制”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任期三年改为四年。“国会”改革的内容，会影响台湾政治生态的进一步变化。因为，选举制度对政党体制有重要影响。单一选区两票制对处于执政地位而掌握行政资源的民进党及在基层拥有厚实组织基础的国民党有利，而对既无行政资源，又缺财政实力，更缺基层组织的亲民党、台联党以及无党联盟等小党派不利。这些党的从政人员为了寻求政治出路，不得不投靠大党，这就使其他党逐渐式微，客观上推动了政党的集中。台湾两党政治的趋势更加明显。

2. 从政党的力量上看，民进党的力量会进一步发展壮大，国民党的力量还会削弱，民进党与国民党的力量对比会进一步发生变化。

实际上，从1986年民进党成立起，台湾的政治生态变化的主要表现就是，民进党的力量不断崛起和壮大，国民党的力量不断下降，直到2000年台湾实现政党轮替，民进党登台执政。从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的各项选举来看，民进党的势力继续扩张，国民党的力量加速萎缩。2004年的“总统”选举，虽然呈现出蓝绿双方旗鼓相当的局面，但从投票结果来分析，蓝绿的基本盘发生了一些挪移，蓝绿在迅速接近。选后，蓝消绿长的态势似乎仍在继续发展。从地域上看，民进党以往号称是代表闽南族群的政党，只在南部称霸。经过这次选举，民进党在地域上也有所扩张，在中部和北部选票有所成长，而且许多传统的国民党票仓如客家、原住民也逐渐瓦解、变色。台湾的政治板块开始发生变化。从泛蓝的情况看，继2000年大选后，国亲合作仍不敌民进党，对泛蓝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选后的半年多，泛蓝仍未走出“3.19”枪击案的悲情和迷乱。泛蓝内部，围绕本土与非本土之争重新凸显。同时，后连宋时代提前来临所引发的世代交替的呼声和权力矛盾越演越烈，加上资源匮乏，士气低落等问题的困扰和省籍间的猜疑挥之不去，国亲之间围绕合并，国民党内部如何调整路线、纲领、政策，如何实现世代交替，如何找回希望，找回远景，如何在痛定思痛的省思后重新出发，都存在矛盾和争执。这些都给外界留下不好印象，泛蓝的选民似乎仍在流失，民进党长期执政的趋势比较明显。

3. 政党的趋同化趋势加剧。

在其他国家或地区，一般是依各阶级或政治势力对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态度或行为准则，将政治势力分为左中右派。但冷战后，政党纲领、政策的趋同化、政党差距的缩小或界限的模糊，成为西方政党政治的一个新特点。例如，冷战后，美国两党政治差距缩小，两党在政策方针的实质性内容上，没有根本性差别，在内外政策主张上大同小异的趋势日趋明显，美国政治出现了“向中间靠拢”的突出现象。^[11]台湾的情况有些不同。诚如日本学者若林正文所指出的，“台湾的意识形态结构与一般工业社会不同，‘左右’因素不明显，代替‘左右’因素而成为主要排列标准的是所谓‘统独’因素。‘左右’因素并非没有，但是极其微弱，处于附庸地位，从属于‘统独’因素”。^[12]不过，随着台湾本土化的推动，主要政党在纲领政策等方面的趋同化也相当明显，在“统独”光谱上的差距缩小。这在国民党表现得更加明显。为了选举的利益，

国民党愈发本土化，弱化其中国色彩，不再坚持统一的取向，反对一国两制，不排除、不反对“台独”选项等。这一切都使其与原来的国民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与民进党表现出某种趋同。贴近本土、去中国化，强化主权与主体意识，强化对台湾的认同，似乎成了台湾政党的未来趋势。这些不仅对政党本身产生影响，也会对两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 [1] 吴文程：《政党与选举概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1月初版，第125页。
- [2][3] Duverger, M.: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John Wiley, 1954), P.204.P.135.
- [4] Alan Ware: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Oxford University 1996). P.191.
- [5] Duverger, M.: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John Wiley, 1954), P.205.
- [6]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164页。
- [7][8] 傅金铎等主编：《国外主要国家政党政治》，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36页、第37页。
- [9] 香港《中国评论》，第28期。
- [10] 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211页。
- [11] 参见刘丽云等：《美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99页。
- [12] [日]若林正文编著：《转型期的台湾政治》，纽约《联合日报》1988年6月25日。

(上接第11页)

注释：

- [1]以下“公投法”的内容及投票情况均引自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2003年11月28日。
- [2] 台湾《自由时报》，2003年11月28日、2003年12月8日。
- [3] 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11月30日。
- [4] 台湾《联合报》，2003年11月28日。
- [5] 台湾《联合报》，2003年11月30日。
- [6] 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11月30日。
- [7] 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12月3日。
- [8] 台湾《联合报》，2003年12月3日。
- [9] 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12月6日。
- [10][45] 台湾《联合晚报》，2003年12月6日。
- [11] 台湾《联合报》，2003年12月6日。
- [12] 台湾《自由时报》，2003年12月8日。
- [13] 《人民日报》，2003年12月10日。
- [14] 台湾《中央日报》，2003年12月10日。
- [15] 台湾《联合报》，2003年12月11日。
- [16] 台湾《联合报》，2003年12月17日。
- [17][18] 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12月17日。
- [19] 台湾《中央日报》，2003年12月18日。
- [20] 台湾《联合报》，2003年12月23日。
- [21] 台湾《中央日报》，2003年12月21日。
- [22] 台湾《联合报》，2003年12月21日。
- [23] 台湾《联合报》，2004年1月12日。
- [24] 台湾《联合报》，2004年1月11日。
- [25] 台湾《联合报》，2004年1月13日。
- [26] 台湾《联合报》，2004年1月12日。
- [27] 台湾《联合报》，2004年1月16日。
- [28] 台湾《联合报》，2004年1月14日。
- [29] 台湾《中国时报》，2004年1月17日。
- [30] 台湾《联合报》，2004年1月7日。
- [31][32] 台湾《联合报》，2004年1月17日。
- [33] 台湾《中国时报》，2004年1月17日。
- [34] 台湾《中国时报》，2004年1月18日。
- [35] 台湾《中央日报》，2004年1月28日。
- [36] 台湾《联合报》，2004年1月30日。
- [37] 台湾《联合报》，2004年1月31日。
- [38] 台湾《联合报》，2004年2月3日。
- [39] 台湾《中央日报》，2004年2月8日。
- [40] 台湾《中国时报》，2004年2月4日。
- [41] 台湾《联合报》，2004年2月12日。
- [42] 台湾《中国时报》，2004年1月6日。
- [43] 台湾《联合报》，2004年1月17日。
- [44] 台湾《联合报》，2004年1月18日。
- [46][47][51] 《新新闻周刊》，2003年12月24日。
- [48] 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5月9日。
- [49] 台湾《联合报》，2004年1月17日。
- [50] 台湾《联合报》，2004年2月11日。